

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



山东省《齐鲁考古丛刊》编辑部 编



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

山东省《齐鲁考古丛刊》编辑部 编

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

山东省《齐鲁考古丛刊》编辑部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9.75印张 2插页 184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书号 11206·109 定价 2.10元

目 录

对山东史前考古的追述与瞻望(代前言)·····	杨子范(1)
山东史前考古·····	苏秉琦(17)
山东地区史前考古方面的有关问题·····	石兴邦(22)
山东地区史前文化概论·····	高广仁(40)
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 类型的研究问题·····	李仰松(56)
胶东原始文化初论·····	严文明(63)
胶东史前文化初探·····	韩 榕(96)
岳石文化 ——山东史前考古的新课题·····	邵望平(120)
论潍、淄流域的原始文化·····	杜在忠(129)
山东史前文化在中华远古文明形成中的地位 ·····	黎家芳(154)
试论大汶口文化及其有关问题 ——中国原始社会文化探索之二·····	石兴邦(177)
试论北辛文化 ——兼论大汶口文化的渊源·····	吴汝祚(196)
试谈北辛文化及其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 ·····	郑笑梅(211)

试论大汶口墓葬所反映的社会性质王锡平 (234)

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王树明 (249)

对山东史前考古的追述与瞻望

（代前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杨子范

一九八二年八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考古学会，在山东省荣成县石岛，召开了第一次山东史前考古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胶东半岛的原始文化；

关于大汶口文化；

关于龙山文化；

关于夏文化。

以上几个议题，对中国考古界、史学界来说，都是多年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中国东方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古代社会史应当如何编写的问题；关系到如何以科学的态度、观点、立场、方法去揭示、解释中国原始社会不同区域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变革的规律等等。当然，在探讨过程中，发生这种或那种不同见解乃至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合乎认识事物规律的。这次讨论会就是按照求同存异，各抒己见的原则进行的。

在开展山东史前文化探讨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们，如揭开山东史前考古“序幕”的吴金鼎、梁思永、李济、董作宾、尹达诸先生。他们有的已经谢世，有的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五十年前，是他们首先发现、发掘了城子崖遗址，并提出龙山文化的命名。这一成就对瑞典人安特生的所谓“仰韶文化报告”是一有力地回击。安氏“报告”的目的无非是散布中国文化西来的谬论，而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证明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的东方早已有了人类的活动足迹，因限于当时的条件，对整个半岛地区史前人类的活动情况，未能作出全面的了解。

不应隐讳，五十年前山东的史前考古只是提出了问题，还未能认识到它的规律性，所以更难谈到掌握其规律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考古界和史学界形成了一个概念，总以为在中国黄河流域的所谓史前一段人类历史，只有两支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后来考古学界在探讨史前文化时，便形成一个公式，即：凡遇到原始社会时期遗址内涵中，含有红陶、彩陶者，即称之为仰韶文化；含有黑陶、灰陶者，即称之为龙山文化。随后又是什么典型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等。这些命名，没有或者很少涉及到地区性史前人类活动的经济与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而是离开了人同社会、生产、生活的关系，仅偏向于依靠着陶系、陶质、陶器造型等简单工艺去探索中国史前社会史，无疑，这是学术研究上的缺陷和片面性。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来，山东的史前考古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史前原始社会遗址，先后发现一百多处，有的发表了资料，有的正在研究、编写报告，有待公布于世。

分布在黄河下游入海处和整个山东半岛上的史前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可以说星罗棋布，比比皆是。那么为什么过去考古界未予重视？

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考古学界对山东一带的史前考古，受了过去史学界治学方法的影响，就文献论文献，仅依《史记》、《左传》、《后汉书》等历史文献所载诸“夷”在史前中国东方活动的茫然情景，加以论述。

第二，新中国建国以后，部分考古学者，因受不同程度传统观念或传说的影响，对山东半岛未被开垦的考古处女地，没有进行系统地调查、发掘工作。所以，山东半岛的史前考古是没有地位的，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山东的史前考古工作，确实忽略了地方性的特点而走了一段弯路。曾经认为：山东的原始社会文化是继承河南的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并以此类推。比如，笔者在五十年代中期，对山东安丘县景芝镇、曲阜县西夏侯村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资料，仅依据“陶系说”，没有进行社会性分析研究，便笼统地划为龙山文化，将滕县岗上村含有红陶、彩陶的遗址，定为仰韶文化等等。

五十年代晚期，发现和认识了大汶口文化是一支独立的原

始社会文化，为探讨山东史前史，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初次接触和认识一支文化，以至于找到其自身的规律性，然后为其命名，确实需要经过反复地认识过程：当我同已故考古界前辈王献唐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中旬，见到当时济南市博物馆副馆长刘锡曾，他随身带来一批大汶口遗址的陶片标本，当我们见到这些红陶、彩陶、灰陶、黑陶和蛋壳黑陶片时，如同见到了陌生人，相对无语，实在是叫不出名姓来。及至同年四月二十四日我们到达大汶口，开始了发掘墓地的的工作。在发掘到M4时，发现了红质白彩陶壶，便认为该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类型；当发现M10和M47随葬陶器中，有红陶、灰陶、白陶盂和红陶袋足鬲和薄于蛋壳的黑陶高柄杯时，又引起了思路上的混乱，认为这一遗址的时代属于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时期，即所谓混合文化。所以，在工地编写的一份《简报》结语中，写有“……既有仰韶因素，又有龙山因素……”的词句。这说明，当时对这一文化并不认识。尔后，我逐渐地意识到：大汶口的原始社会文化与仰韶文化，不属一事。倒与山东的龙山文化关系接近。于是与王思礼先生商谈此事，并于同年合写了《试谈龙山文化》一文。但由于材料和水平的限制，只就器物的类型做了必要的说明。真正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工作，还是我们在编写《大汶口》报告过程中，经过多次地排比工作，摸到了这一文化的自身规律，最后才提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命名。

大汶口文化的特点是：

一、从养猪业的发达程度上看，可知当时已进入了农业发展时期。

二、制陶工艺、造型上，它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有着严

格的區別。大汶口文化多是棱角明顯的平底器，器物組合為鼎、豆、壺、杯、鬻。這與中原地區是不同的。

三、死者頭向東方，學者多認為，原始社會墓葬的頭向，可能反映它們死後要回到自己家鄉的意念。如是，這應表示大汶口人起於東方，本是東方人，不屬西方人。

四、合葬墓主的排列，是男在左女在右。

五、在殉葬器物的數量上，多、寡有明顯的差別。隨葬品多少不同，是貧富分化、階級產生的標志。大汶口的墓地材料表明，山東地區原始社會的貧富分化、階級的產生以至於進入階級社會的時間，在中國的黃河流域一帶，時間上比其他一些地區要早一些，文化也較為發達。

山東大汶口文化的被認識，應當肯定地說，是中國考古學界對中國東方史前社會史研究課題中的一項大的突破。不過，在命名這一原始文化時，亦非輕易。當一九六一年春，陳晶晶同志同筆者提出大汶口文化的命名時，即有“權威”人士的反對和抵制。這些學者雖提不出任何反對的根據，但卻各方不予承認。但是，我們的提法得到了中國考古界的前輩蘇秉琦、石興邦、張效光 and 原山東省歷史研究所朱活、山東大學歷史系劉敦愿等先生的支持和贊同；南京博物館曾昭燏院長和尹煥章先生也對這一命名表示同意。

關於發現和提出由大汶口文化向山東龍山文化過渡並屬繼承關係的根據，是依據大汶口墓地中M10、M47等幾座墓中的隨葬陶器的特征，與昌潍地區安丘景芝鎮墓葬中的隨葬陶器，相互引證而得出的結論。

至于一九六二年的《文物》第十期，所刊伍人一文，提出曲阜縣西夏侯村原始社會遺址所獲資料，是確立命名大汶口文

化之本，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在时间上，是在曲阜西夏侯村工程发掘之前，而西夏侯村遗址的被认识，恰是在大汶口遗址的发掘工作之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山东继大汶口文化发现之后，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陆续地发现、发掘了胶莱河附近的三里河遗址，潍县的鲁家口遗址，鲁西南一带的兖州县王因遗址，滕县的北辛遗址，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发掘的日照县东海峪遗址，邹县的野店遗址，以及胶东半岛沿海一带的古遗址等等。这些史前考古资料堪称丰富多采，有的资料虽未完全公布出来，但已披露出的考古线索，是很值得研究和探索的。

三

山东省所处的地理环境，从我国的地图上，一眼便可看到好象一支“触角”伸向了黄海、渤海湾。有“似诗与画”、“景色迷人”，气候温和的胶东半岛，还有珍珠般的长山列岛和连绵的泰、沂山区。对考古界来说，在建国前、后的一个时期，只知道中国史前考古仅有黄河流域的所谓仰韶、龙山两大文化系统，“形成中华民族之宗”。历史的事实是，一个民族的形成是由许多内在的和外来的因素逐渐融合而成的，从来不是一元论。这一规律也可适用于考古学文化。但是，我在五十年代初期，对考古学的理解上，既简单又偏狭，只知道黄河流域在史前考古上的零星材料，依据有限的文献记载，发表一些一知半解的议论，对于胶东半岛的史前文化则什么也不知道。所见到的有关黄海、渤海之滨的史前资料，还是五十年前日本学者鸟

居龙藏曾叙述的荣成一带的巨石文化。这一发现究竟如何？至今还是个“谜”。但是，这位日本学者总算是对这一地带，提出了考古学上值得注意的看法。六十年代，我对有人认为胶东半岛的史前文化落后，曾有过疑问：为什么如今胶东濒海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地高于内地，而古代的人们，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却落后于内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种古代文化落后于内地乃至于是考古空白点之说，是不合情理的，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对胶东沿海史前考古工作的开展，原曾打算在七十年代初，进行一次系统性的调查、发掘工作，因种种原因，这个意愿未得实现。

七十年代的中期，考古学界的前辈苏秉琦先生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来到这三面环海曾为考古界称为考古空白区的胶东半岛上，他们为开展探索东海之滨的史前文化，辗转于整个半岛和隐显在渤海湾而绵延伸向辽东半岛的长山列岛中的若干岛屿，经过了几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将湮没若干个世纪的胶东半岛史前文化的秘密，初步地揭示出来。尽管所获得的资料尚未发表，而实际上已经证明了这个半岛在古代并非一处荒无人烟的草莽地带，在所谓的史前一段很长的岁月里，就已经有先进的人类物质文化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笔者同本所王瑞成、王树明、袁明、张振国等几位同志，专程去胶东半岛上的荣成、文登、乳山、海阳、栖霞、黄县、掖县等县、市，对其所藏的史前考古实物资料，作了粗略的调查。语云，“闻名不如见面”，此话虽俗而实。大量的实物资料，多是史前胶东半岛上的原始人所留下来的生产工具。这些工具，多是经过简单打制的石质、直径0.5

cm左右的猎球和石条式工具和少量的还不能称其为陶器的泥质生活用具；从荣成县文化馆所存原始人渔雕工艺品可以说明，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崇拜的是海中的鱼类。由此可以证明，在考古学上所称道的旧石器文化，胶东半岛上也应当存在。即使一时尚未找到原始人遗迹，乃是因为考古工作做得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里总会找到最早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从当前看到的原始遗物，证明这一带原始社会的人们，是依靠渔猎，依仗海滨的软体海产品如蛤、蛎、蟹等而生存，由于他们长期以高蛋白质为食品，可以推想，当时人们的体质是健壮的，脑神经系统也一定会富有智慧和创造能力。

沿海一带的原始渔、猎人，由简单的流动渔村，逐步过渡到定居的渔、农业村落，因而人们的制陶工艺也逐渐发展了起来。但这时只能制作质粗、壁厚而笨拙的红陶器。在荣成县海滨的河口原始社会遗址中，见到的陶器均是手制，笨、粗，且看不出规律性的组合。遗址中大多有大量的蛤蛎等壳皮堆集，证明人们主要生活资料来源，是依海为生。人们由沿海迁移到半岛内地，成为原始的农业村落时，便是今烟台市附近处的所谓邱家庄类型遗址。这一时期的石器已是磨光、精制，陶器种类繁多，工艺先进为主要标志。

在蓬莱县的紫荆山、栖霞县的杨家圈、黄县的唐家泊、掖县的蒜园等原始社会遗址中，可以看到其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如石器、骨器、陶器、医疗器，乃至小儿玩具等等。尤其是原始绘画艺术施用于陶器上，表现出东方原始的现实主义写生手法。着色陶的纹饰，多是勾描大自然界的景物。如：波浪滔天的水势，或日升东方，或缀以微波的静静的海面，或渔网式的纹饰等等。在黄县文化馆里，还保存着一件唐家泊遗址中出

土的刻画图案，似有原始文字的意义。这一重大发现，在胶东地区还是第一次。

素为考古界所未注意，并认为是微妙的长山列岛，近几年也发现了许多史前社会的遗址、遗迹、遗物。发现的遗存有的可能是中石器时期；也有的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史前时期的人们，如何跨海而来？这些史前人类由何地迁来？考古材料告诉我们，他们是由胶东半岛陆地迁来的，并且已有迹象表明，也有向辽东半岛迁徙的趋向。至于有人说，当时长山列岛原是一条通向辽东半岛的陆路，后因地壳变动而下陷为海等等，此乃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课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关于长山列岛上的考古工作，近几年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主持，陆续开展起来了。详细资料将由北京大学整理报告，不久当可问世。

胶东半岛的史前考古工作，不到十年的时间，终于为考古界拨开了层层疑云。认为“胶东无古可考”的说法，可以止矣！事实说明，地处中国最东端的地带，史前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同样应当给予重视。

大家知道，胶东半岛是一个古陆块，早已为古生物学者所关注，这个半岛，从远古时代起，物质文化遗存是很丰富的。近年来旧石器中石器时代遗迹、遗物的发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胶东地区是否也是中国人类发祥地之一呢？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胶东地区的原始文化，一支由东向西往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发展；一支经长山列岛向辽东半岛上发展而去。

胶东半岛上所发现的着色彩陶，有人认为是大汶口文化传播的结果，或者是受到了它的影响。此说与客观事实是不相符的。因为：第一，从彩陶器的工艺、造型、绘画风格、内容上

看，两相比较，是完全不同的。胶东半岛的彩陶器，色彩、绘画风格，反映的多是自然景物，同时，又具有原始浪漫主义的色彩，远不如大汶口文化彩陶的纹饰那样抽象、规矩、有序。第二，地理条件往往给历史发展以助力、阻力，愈是古代愈是这样。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区域与胶东相距千里之遥，说后者是前者的传播、影响的结果，显然也是缺乏根据的。

至于所谓胶东半岛上的龙山文化，可以肯定地说，这里所谓的龙山文化只可说就时代相当而言，它不等于“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非加等号不可，只能说是概念上的混淆。不过这一问题要追问一个究竟，尚需待后再议，可暂作悬案。

鲁南一带的史前考古工作，以前考古学界仅知道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且至今没有正式发表资料，只有一些不系统的调查材料，对遗址所反映社会性质的了解，似是而非。对这一地带史前文化的探索工作，未能引起重视。应当说是一个失误。但六十年代初期，南京博物院已故的尹焕章先生，注意到鲁南的史前考古工作，他曾两次由江苏省的北部，越过省界，调查过鲁南一带的史前文化，可惜的是，材料未及公布于世，先生即与世长辞了。

不应以任何借口为理由来原谅自己。山东考古界在建国以后，未对鲁南一带的古代文化遗址、山川河流，作系统的历史考查。将重点单单放在鲁中南一带地方，因而失去了发言权。

一九八一年秋，沂源县发现了据鉴定相当于北京猿人时代的沂源人头骨化石及其他兽类骨。一九八二年，兖石铁路考古队在临沂县发现相当于中石器时期的遗址、遗物。另外沂、沭二河流域，分布着极为密集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村落遗址。七十年代末，在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葬

中，发现了十七个刻有原始文字的陶器。上述种种，说明山东的沂蒙山区一带地方，乃是中国东方又一人类文化发源地之一。

有关鲁南地区的史前文化，文献记载甚少，亦不系统。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一再证明，沂蒙山区，古沂河流域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原始社会的人们，依仗纵横交错的巨大河流，依山为猎，傍水为渔，生息、繁衍。随着时间的前进，经过漫长的发展道路，这里的人们逐渐地迈入了新石器时代，分别沿着不同的河流或支流，向今泰、莱平原，鲁西平原，鲁中、鲁西北平原地带，交汇地发展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大概也已进入了部落集团时期，出现了农业村落，过着定居的锄耕农业生活。

在泰山山系和汶、泗流域，近几年陆续地发现了许多史前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有的属于大汶口文化；有的处于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首尾衔接的阶段，形成了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又一个原始社会文化体系。

关于大汶口文化的特点，已有刊本问世，本文前段也有略述，这里不想过多重复。应当看到，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原始社会时期，由于某些条件不同的原因，有的地区比较先进，有的地区发展缓慢。所以，在开展对大汶口文化，乃至史前时期的原始文化的研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四

关于山东龙山文化，考古界学人已有不少的文章从各个方面论证了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和继续。

提及山东龙山文化,对中国的考古学家来说,如同老朋友见老朋友一般熟悉。有意思的是,这一文化所分布的地区,只限于今山东地区。笔者曾为调查该文化:南至苏、鲁边界;西至鲁西的菏泽;北至聊城、德州、惠民;东至胶东半岛并长山列岛。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面貌。比如:石制、骨制等生产工具,尤其是陶器的组合如鼎、豆、壶、杯、鬻等,各地差别不大,陶器组合似乎制度化。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这种器物组合体,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而且,一直到商周时代的礼制器皿,也即由此导源而来。

近年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潍坊地区等考古界的专家们,先后在诸城县呈子、胶县三里河、潍县鲁家口等地,对龙山文化遗址,做了大量地发掘工作,与此同时,在胶东半岛上也做了许多工作。就这些遗址的物质文化的面貌来看,似可这样说,山东史前龙山文化“统一”了整个山东半岛。

中国东方的(今山东地区)龙山人是怎样“统一”和“统治”这一半岛地区的呢?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假如当时没有较发达的经济基础,没有一定高度的文化,没有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来做好社会的组织工作,没有一些合乎当时人们利益需要的原始法规等手段,这种“统一”、“统治”是令人难以设想的。考古工作者不仅要研究古代社会的生产力,通过这一手段揭示当时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还应在这—研究基础上,去揭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等等。这是摆在我们考古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里不惮其烦地再重复一句,龙山文化在它的末期才传播到胶东半岛上,它同胶东地区的原有的原始文化并非一个文化